



KONGZI

孔子

杨书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

Kong Zi

孔子

杨书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孔子

杨书案 著

张正平
责任编辑:

欧阳忠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837121)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4 印张:11.375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1—6000 册

ISBN 7-5354-1722-1/I·1311

定价:16.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孔 子



孔丘
理詩
楚



内 容 提 要

全世界几乎都知道孔子这个名字！

日本井上靖先生因著《孔子》而获奖！

再作《孔子》，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摆在你面前的这部《孔子》，能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象呢？直率地讲，如果井上靖先生的《孔子》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又有艺术价值的“大书”，让你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那么这部《孔子》将使你经历一次历史的巡礼，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让你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孔子。

杨书案，这位在历史题材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的小说家，《孔子》可以说是他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小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把自己全部的历史经验和艺术技巧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从而使《孔子》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理性内涵。

这是一部既雅又俗、大雅大俗的作品。可能比井上靖的《孔子》更有魅力。如“子见南子”这样男女间的事，井上靖先生没有提及，而作家杨书案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诸如此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倘若好奇，请你读读这部中国自己的作家写的“大书”吧！

孔子：从精神偶像到艺术典型

(序)

缪俊杰

杨书案的长篇历史小说《孔子》，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很快拜读完的。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新著，使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历史的巡礼，也得到了艺术的享受。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告慰我这位在历史题材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的朋友。

—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影响已经不限于中国，而已遍及世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1989年10月，在儒学的发源地中国的首都和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学者，共聚一堂，纪念这位已经逝世两千多年的思想家，足见他的影响的悠远和广泛。两千多年来，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对他的膜拜和不敬，人们写下的文章，已经很难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孔子，作为一个“精神偶像”，已经牢固地树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水准和年龄层次的人们的心目中。我敢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

何一位思想家在炎黄子孙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国思想家超越时空界限，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承认。如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衡量，孔子的思想当然存在许多缺陷，有着严重的时代局限性，对社会的发展也有许多消极的影响，但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形象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文学艺术作品，我没有作详细的考证。孔子逝世不久，鲁哀公给他写的谏文中称他为“尼父”，表示了对他的尊敬；过了三百年，汉高祖刘邦过鲁，用“太牢”（祭天的大礼）祭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元帝将孔子封为“褒成宣尼公”。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玄宗开元 27 年把孔子封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又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 11 年，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他的画像遍布在各种庙堂殿内。孔庙圣迹殿，是孔子画像的世界。正面墙上 100 多幅刻有孔子画像、记载着孔子一生事迹的明刻《圣迹图》，其中有相传为晋人顾恺之手绘的“孔子为鲁司寇像”，以及“子行颜随像”、“孔子燕居像”、“孔子行教像”。这些石刻画像，有帝王化了的形象；有的则是呈现出他作为慈祥的老者，高雅的文人，渊博的学者的形象。目前国内外孔子像约有几十种，包括画像、印制、刻石和雕塑几种类型。此外，戏曲中也出现过孔子，到了近年，更有《布衣孔子》，孔老夫子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在文学创作中，除了诗词中的描写外，用小说形式描写孔子，最有影响的应该首推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孔子》。

井上靖先生是日本的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历史小说蜚声文坛，尤其是《天平之甕》、《楼兰》、《苍狼》、《敦煌》等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展现了中国远古文化多姿的历史长卷，抒发了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厚感情，把人们带回到远古遐想中去，感受到文明古国的神韵。他的长篇新作《孔子》，表现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部小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获得“野间

文艺奖”，不少国家翻译出版。他七十岁开始读《论语》，获得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到八十岁完成作品，八年间六次到山东、河南实地考察，其中两次走进鲁都曲阜，四次踏入河南中原，甚至为搞清一个地名，特地到信阳郊外，探寻叶公问政于孔子的城镇负函，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以巨大的魄力，超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用沉默而透彻的眼睛，力图把人类文明史初期的思想结晶化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希望之书”。书中通过虚构人物蒧姜的叙说，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命运、历史、社会的沧桑巨变的心灵的呼喊，他企图在孔子和儒家的巨大思想文化宝库中寻觅一种透明的纯洁，把人类从痛苦、不幸、矛盾、灾难的相克中拯救出来。他把孔子作为一个“人”来描写。为了写人物，才借来“历史”这个场景，又借人物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心灵深处奔腾着的巨大的历史长河。毫无疑问，井上靖的《孔子》是富有哲理意义，又有艺术价值的一部“大书”。我读了这部杰出的作品，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但沉静下来，一经反思，顿时又醒悟：这毕竟是外国人写的书。孔子出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写的塑造孔子形象的书呢？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杨书案寄来的他的长篇小说《孔子》书稿，真是喜出望外。

在享有国际声誉的大手笔井上靖的《孔子》之后，杨书案的《孔子》将会有何反响呢？目前还难以预测。但在读过杨书案的《孔子》书稿之后，我至少得出这样的印象，杨书案笔下的孔子，是表现中国古代文化氛围和文化心理，充满中国的社会风情和生活色彩的艺术典型，同井上靖笔下的孔子是完全不同的，是杨书案塑造的“这一个”孔子。

二

杨书案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长篇小说《孔子》，可以说是他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小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把自己全部的历

史经验和艺术技巧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从而使《孔子》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理性内涵。

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杨书案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他是从童话创作起步的,但真正使他在文坛占有一席地位的是他的历史小说。1981年,他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九月菊》问世。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悲壮历程,塑造了起义领袖黄巢的动人形象。1983年,他的第二部长篇《秦娥忆》出版,这是写秦始皇的,从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六国,结束长时期七雄纷争,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开拓“六王毕,四海一”、“车同轨,书同文”的恢宏气象,表现了风云变幻的一个时代。1984年,《长安恨》作为《九月菊》的续篇与读者见面,它描写了黄巢所率的起义军从鼎盛到败亡的过程,完成了黄巢这位义军领袖的悲剧性格。过了两年,即1986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半江瑟瑟半江红》问世,这是写隋炀帝大业年间的若干重要事件,从宫廷政变到强娶女妃,从修赵州桥到开凿大运河,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隋炀帝的复杂性格。这四部长篇之后,杨书案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金戈铁马转向宫帏秘事,于是就有了《风流武媚娘》和1988年版的《李后主浮生记》(又名《几曾识干戈》)。后者表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生涯。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李煜既是一位风流儒雅的帝王,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人。从他被掳北上囚居汴梁,过着屈辱的俘虏生活到被赵光义毒死,充分地展示李煜的悲剧性格。毫无疑问,这些作品都为杨书案赢得了声誉,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小说的特殊创作规律来说,《孔子》同他以前的几部历史题材相比,创作上具有更大的难度。它的难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孔子的“知名度”太大了,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的形象;二是孔子的历史太久远,关于他的生活的具体资料太少了。学者们可以根据一部《论语》去研究和阐述孔子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作家仅仅根据《论语》来写小说就

大大不够了。因为文学作品除了思想和主题之外，还需要丰富的故事和情节，才能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长篇小说《孔子》中，我们看到了杨书案的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作家把史书上的断简残篇和孔子的片言只语，化为有声有色的故事和生动感人的艺术情节。例如，关于孔子的出生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究竟何谓“野合”，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孔子的出生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一桩历史的悬案。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杨书案在《孔子》里，描写梁纥与征在是一对老少夫妻，非仪礼而婚，非仪礼而育，很显然是根据司马贞的观点来铺排故事、虚构情节的。而非按照汉代学者郑玄在《礼记·檀弓》的注解中的观点，即所谓叔梁纥对颜氏之女征在施以强暴性行为而生孔子的。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是可以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具体的细节作符合艺术规律以虚构的。我觉得作者对孔子出生所虚构的细节，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展现人物的性格的。

作者在对孔子这个人物的把握上，避免了过去对孔子的所谓“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研究具体历史环境出发，把孔子作为活生生的人，由此而把握孔子的性格。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十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孔子是一个定了型的人物，即认定孔子一生尊崇周王，礼敬鲁君，从政治国都是维护当权者的利益，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或认为孔子的言行有利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两者结论虽然不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即比较简单地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在文学创作上如果简单地在孔子身上贴上阶级的标签，人物塑造很可能是脸谱化的。杨书案没有采取贴标签的方法，而是在开掘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方面下力气，把孔子置于春秋战国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氛围

之中，表现出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化心理。

杨书案的历史小说涵盖着浓重的悲剧意识，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悲剧的历史氛围。他的几部长篇历史小说，几乎都是如此，在这部新作《孔子》中，也包含着悲剧的色彩。孔子智慧过人，博学多才，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大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祖国鲁国，虽然做过几年“司寇”一类的小官，但却不见重于君王；他处处维护君王的利益，君王对他并无厚爱，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好在当时不限制“人才流动”，所以孔子能兴办教育，带着一大帮学生“周游列国”，企图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出走异国，仍然命运不济。他先到了卫国，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却受到其夫人南子设下的圈套的侮辱；离开卫国想投奔晋国，不料在汾河边上险些被赵简子暗算；折回来投奔宋国，宋君不用他，不得不在馆舍的大树下讲学等待，不料又被宋国权臣砍倒大树把他赶出国门；后来又困在陈国和蔡国的边界上，一连七天没有饭吃，只得用野菜充饥。孔子不气馁，仍然采取乐观的态度，“弦歌不绝”。随同出游的学生子路和子贡困惑不解，便问孔子道：“我听说，为善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降以祸，夫子一向积德行义怀美行，为什么总是受困穷呢？”孔子回答说：“你把事情看得太绝对，想得太简单。有才智的人都能被任用吗？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被商纣王剖心而死呢？忠义的人都能见用吗？那介子推为什么抱木焚死？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的多着呢！难道只我仲尼一人？贤与不肖素质不同，遇与不遇时机不同，生不逢时贤才无用武之地。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当了周的军师！管仲囚于槛车，遇到齐桓公才为相。芷兰在深山之中，人不见也就不知道它的芬芳，所以君子好学，修身端行，以待其时。”孔子对子路、子贡说的这番话，包含着孔子对人生的理解，也透露出孔子的悲剧命运是时代使然。如果说井上靖先生的历史小说《孔子》中，书中虚构的人物蒯姜在深山寒村独居三十二年的孤独、与内心对话的岑寂正是作者对历史感情的浓缩、美学观念的抒发，那么，在杨书案的

历史小说《孔子》中的孔子的这段内心剖白，何尝又不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美学观念的阐发呢？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历史深度，正是透过人物的具体形象折射出来，这也正是《孔子》的深刻的思想内涵的艺术显现。作品的力度也正在于此。

三

小说作为叙事性的一种文体，发展演进到某一阶段，已经不能满足于“讲故事”这个层次了。人物成了艺术表现的中心，小说家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和艺术重心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把塑造典型人物当作自己追求的美学目标。因此，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成了判断一部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孔子》塑造了包括孔子、子路、颜回、子贡、曾参、卫灵公、南子夫人、季桓子、阳虎、蘧伯玉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有些人物写得很有光彩，使人难以忘怀。

《孔子》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当推主人公孔子。千百年来，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尊“精神偶像”，孔子完全帝王化，甚至成了凡人不可企及的“神”。而长篇小说《孔子》里，作者则把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卓越的知识分子，一个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息又屡遭失败的悲剧人物。作者循着某些历史资料所提供的线索，通过对孔子的思想命运多侧面、多角度的展示，把人物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孔子出生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父母“野合”（没有正式礼仪）而生他的个人命运，使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逆反的性格。他非礼而生，就使他很早就觉悟到“礼”的重要。他生活在“礼毁乐崩”的时代，就使他感到拯救礼乐的必要。作者用许多生动的细节表现孔子特殊性格的形成过程。年岁稍长，他就意识到“男女大防”的重要，主动提出要同自己的母亲分开住。而这同当代某些小说中描写的所谓“性意识的觉醒”是不同的。他刚

刚习武学射，就把射的鸟给母亲吃，以表现他的“孝”，母亲提出要他娶亲，他也唯母命而从之。他对周礼的崇敬到了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的地步。正是对古训、周礼的崇敬，在品德修养上的严格要求，打下了他以后从政治学的坚实基础。

孔子的悲剧命运应该说是从他从政以后开始的。他在鲁国做过几年小官，但这位博学多才、知书识礼的大知识分子却不见重于鲁国君王。他有一种落漠感，愤愤然从鲁国出走，以图见用于圣主明君。他为什么出走？因为他同鲁国的权臣季桓子等政见不同，“道不同，不相谋。”他的出走，固然是谋碗饭吃，但更主要的是找一个好的环境行道，实现自己多年的抱负，以仁以德治国。但是到了卫国，事情并不顺利，卫灵公没有及时接见他，而却遇到了他不想见的女人南子。“子见南子”的故事在史书里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然而这竟然成了孔子品行上的一个污点。也许孔子本人也不会想到，二千五百多年以后，中国搞了个“批林批孔”，在“子见南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说孔老二“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企图觊觎一个有夫之妇。实在荒唐至极！《孔子》的作者或者无意，或者有心，通过孔子两次见南子的描写，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或者说为孔子做辩证的翻案文章。

南子也是一个有血性有七情六欲的女子。她是宋国公室的女儿，嫁到卫国，做卫灵公的夫人，因为她来自南边的宋国，故取名为“南子”。由于她的美貌和能干，受到卫灵公的宠爱。但是她的受宠却成了朝野攻击的对象。不顺心的事，使她怀念故乡，在感情的深潭里泛起了新的波澜。她成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孔子的到来，成了她挽回名誉的一个契机。有人给她出主意，说鲁国的仲尼先生一向不愿见品德名声不好的人，更不得见女子，如果让仲尼进宫拜见夫人，定能挽回影响。并且设计了诓孔子进宫的圈套。孔子如约进宫见了南子，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却引起了弟子们的非议。在子路责问的目光下，仲尼觉得有愧，又觉得委屈，于是对天起誓：“我

并不是真心想去见她，实在出于不得已而去的。如果不是这样，天惩罚我，天惩罚我！”这个细节把孔子性格中的矛盾和感情世界中的微妙变化，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如果说，孔子第一次见南子，在他心中引起的仅仅是某种不快的话，第二次见南子则使他感到受辱和愤怒了。仲尼进宫见南子，使她心里着实高兴了几天，但南子的心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原来南子在宋国有自己的恋人，他就是宋国的贵公子朝。南子和公子朝虽然多年分离，但恋情不断。南子乘卫灵公的长子蒯聩出使邻国期间，想方设法以想见亲人为名，约公子朝到卫国幽会，由此更引起朝野的蜚短流长。南子又想到仲尼，再请孔子陪她在朝歌市上驱车走一遭，让国人看看当今世上品德最高、学识最渊博的孔丘如何看她，一切流言蜚语就会自然消失了。孔子果然中计，随卫灵公和南子同游朝歌。孔子这次讨了个没趣，还受到世人的非议，因而感到受辱，愤愤然收拾行装离开了卫国。孔子两次见南子的情节是虚构编造的，但却把孔子和南子的性格都作了有力的刻画，在作品中可算是精彩的一笔。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杨书案的《孔子》中，“子见南子”作为刻画孔子性格的重要情节，而孔子与南子之间的往来，在井上靖的《孔子》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是两位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文化心理也不同。中国的作者更多地注意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孔子，日本的作者则更注重从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角度来理解孔子。井上靖认为，孔子的言论和思想，形成于他的流浪生涯之中，既充满了诗意，又饱含了哲理，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多年，并溶入了人类智慧的长河中。杨书案则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孔子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从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悲剧历程。从不同的文化心理出发，不同国度的作家塑造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孔子形象。这种艺术上的独创性，也正是杨书案的《孔子》的价值所在。艺术是

不能也不会雷同的。艺术家的才华和勇气正表现在从同一个事物中找到不同的东西，从客体中找到“自我”。如果说文学创作中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就是应该从艺术形象中表现出各自的个性。

四

自从小说这种文体出现以来，似乎就有了两个分支：一类被称为“纯文学”，有时也称为严肃文学、高雅文学、精英文学、先锋文学、探索与实验文学等等；另一类被称为通俗文学，有时也称为“大众文学”。“纯文学”的典范作品，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到我国的著名小说，不胜枚举。至于通俗文学，如日本三十年代的武士小说、家庭伦理言情小说、战后的“私小说”、表现各种犯罪推理的“社会派”小说。又如美国的流行小说、畅销书，从十九世纪反映“贫穷——奋斗——致富”的“青年小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集间谍、凶杀、罗曼史为一身的“超级小说”。我国传统的通俗文学包括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爱情故事、公案小说，以及近一时期出现的包括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社会问题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在内的渗透着文化精神的作品，都被列入到通俗文学这个范畴内。而这两类作品都具有各自的审美价值，各自成为审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我不知道，在审美子系统的划分中，杨书案的作品应该属于“纯文学”或“通俗文学”。但我注意到，杨书案的作品，从《九月菊》、《秦娥忆》、《长安恨》、《半江瑟瑟半江红》到《风流武媚娘》、《李后主浮生记》，大体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故事性强，大都有一个前后连贯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二是语言通俗易懂，决无“先锋小说”那种晦涩难懂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的作品划到“大众文学”的行列里也无不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杨书案的作品又绝非当今那些流传于市井的低层次的通俗文学所能比拟的。这不